

文史杂谈

域外风情

### 古代的养老制度

陈永坤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历代封建王朝对尊敬和赡养老人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在夏朝，不孝顺老人者被判重罪，甚至被处以死刑。那时，不赡养老人，殴打辱骂老人，不给老人吃饱穿暖，老人生病不细心照料，都在不孝之列，其子女要受到处罚，处罚内容包括脸上刺字、割鼻子、斩脚、死刑等。

周朝每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其目的是“正齿位、序人伦、敬老重贤、息事端、敦睦乡里”。由地方官主持，60岁以上的长者上坐，50岁以下者站着等候，以示尊敬。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民无宁日，但各国对老人仍然是敬重和关照的。当时规定70岁以上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老人免二子赋役，90岁以上老人免全家赋役。《秦律》上规定了惩治虐待老人的办法：凡是殴打、虐待60岁以上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子孙，要将其流放或处死刑。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西汉时颁布了尊敬和扶养老人的法令——《王杖诏书令》。此令规定，持有“王杖”70岁以上的人，享有各种社会优待。同时，对于无亲属的老人、病弱的老人，也都有明确的照顾规定。汉文帝颁布《授爵法》，明确规定，80岁以上老人每月供给一定量的大米、肉和酒。同时规定：“凡孝于亲者人帛五匹。”不赡养老人者，将被处以死刑，尸体将被展示于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者也将被判重罪。

为确保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了“存留养老”制度，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就是说，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家中无人赡养时，对于不是犯有十恶不赦的犯人，官府允许其留下来照顾老人，待老人辞世后再去服刑。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还在南京建立了“孤独园”，专门收留赡养孤苦老人。

唐代十分注重孝道。规定：“男人七十、妇人七十五以上者，皆给一子侍。”除了定期发给80岁以上老人一定数量的粮食布帛作为养老金外，还规定，每年腊月聚集乡里的老人，行饮酒礼，由政府出资，举办酒宴，“使人知尊老养老之礼”。唐肃宗时建立了“普救病坊”，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南宋时期官府在杭州设立了“养济院”，对无人照顾的老人进行登记，由国家赡养。

明代对老人有三种优待，一是“尊年高”，二是“设里正”，三是“优致仕”。

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凭借国家雄厚的财力、安定的社会环境，先后几次举行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为“康乾盛世”添写了一段佳话。清朝规定，儿子再穷也必须设法赡养父母，如果因贫困导致父母自缢身亡，要按照过失杀人(母)罪杖责100下，流放1500公里。

《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丕尔类。”意即孝子敬老的孝意无穷无尽，势必经常感化影响整个家庭，乃至整个民族。古代敬老、养老习俗，相沿至今，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渔家女(国画) 梁世雄

知味

## 别有创意的餐馆文化

宋子牛

怕三天三夜也断难出此妙语。以“我饿了”作店招，看似土得掉渣，文气缺失，但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和需求呢？这才叫归真返璞，俗中见巧，妙趣横生，有智慧在焉。

店家的独到创意，还不止于此。

待入内坐定，环视厅堂，但见四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币，天花板、柱子、门后、柜台，乃至座椅靠背、方凳上，举凡能粘贴处，几无空白，成为另类装潢。纸币多为美元，也有加元、墨西哥比索、欧元、澳元等，但未见人民币。一元十元面额的都有，一张紧挨一张，上面写着简明字句，无非赞美本地风光、不虚此行、到此一游之类，签了名字和年号。想不到“乾隆遗风”也漂洋过海，在大洋彼岸的这家小餐馆，在欧风美雨中进行着“文化交流”。只不过人家不是在景区内乱涂鸦、煞风景，而是贴币留念，满足一些雅好题写者的愿望。店家的苦心孤诣于此可见，并非想额外多收些散碎银两，不过借此“奇技淫巧”吸引眼球，招揽宾客而已。这种别样的文化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店堂内座无虚席，正宗墨西哥餐的味道，逗得人馋涎欲滴。好奇心使然，我们边吃边张望，饭后对各处贴币浏览了一番。在靠近操作间的墙面上，终于发现了人民

币的身影，对，是人民币！面值一元，我们如获至宝，顿生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有华人处必有人民币，这里它当然不会缺席。所不同的是，这张人民币平展整洁，上面没有写字，只在紧挨的外币边沿空白处，用中文写着“宇宙太阳系地球中国河南郑州八岁孙天麒”。字写得一般，但内容绝对气贯长虹而又不失儿童天真。难得的是，这个小朋友很有主意，没有随大流，走到天涯海角，也记着祖国的人民币上是不能乱写乱画的。他的做法，既入乡随了俗，也表现了自己的创意和立场，丰富了贴币币种，其积极参与的热情与可爱，活灵活现，差堪嘉许。看着中国小朋友的这张贴币，蓦然想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佳话。

“我饿了”餐馆是家夫妻店，丈夫是墨西哥人，妻子是中国人。对究竟何谓饮食文化，也许并未刻意思考，但从店名到贴币，思想活跃、毫无禁锢的他们，用两个文化元素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给游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美国社会，只有多些创意，多些立身本领，才能于优胜劣败中占有一席之地。“我饿了”餐馆的另类思维，既是经营之道，也是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智慧。

旅行归来已有些时日，有时该吃饭了，还会想起那家叫“我饿了”的餐馆。



烟岚(国画) 庞泰

新书架

### 《与上帝的契约》

姜涛

在隐藏50年后，曾在奥地利以医学实验名义屠杀了700多名儿童的纳粹战犯格罗斯终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顶级特工福勒找到。福勒不仅将格罗斯绳之以法，还从他那里拿回一件宝物——格罗斯多年前从一个受害的犹太家庭里掠夺来的镀金蜡烛台。当福勒给蜡烛台加热后，蜡烛融化，半卷古老的铜轴地图展现在他面前。那就是用希伯来文揭示的，几千年前摩西与上帝订立摩西十诫和约柜的位置。不久后，一个由亿万富翁资助，福勒神父主导，组员包括考古学家、军人、医生、杂志记者的探险队成立，他们携带高科技器材，和国际恐怖组织、新纳粹主义团伙及各种心怀叵测的人战斗着，一步步迈向那个埋藏着神秘约柜和全人类终极命运的圣地。

胡安·高美，西班牙知名记者。对神秘现象、宗教学有精深的研究，被誉为继史蒂芬金、丹·布朗后又一位世界级惊悚探秘小说大师。

### 豆沫

马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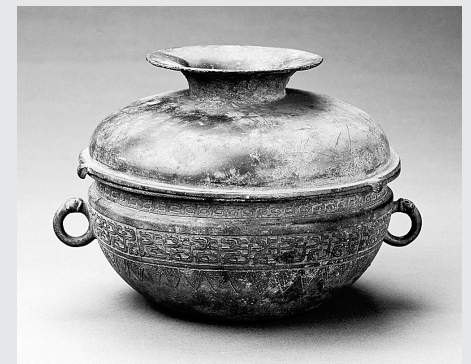
商代，《史记·伯夷列传》里有一段话：“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首阳山豫冀交会处，伯夷与叔齐宁肯饿死也不变节，殷都(今安阳)人感其气节，纷纷祭奠，他们把小米放入石臼中舂成粉羹，做成羹，放入青菜和捣碎的黄豆末儿，呼之为“豆沫”。因其物美价廉、经济实惠，逐渐传遍中原大地和河北一带，成为深受百姓欢迎的中原地方小吃。

由豆沫想起北京豆汁儿。豆汁儿用的是制作绿豆淀粉或粉丝的下脚料。绿豆浸泡后磨成浆，倒入大缸内发酵，沉入缸底者为淀粉，上层漂浮的即为豆汁。豆汁浓醇，味酸中带甜，作为冬、春季流行小吃，风味独特的豆汁儿很受北京人喜爱。记得郭德纲有一段相声，将北京豆汁儿和

河南豆沫都涵盖其中了：“说是走在大街上，看见两个人，‘咚’一脚踹翻，拿一碗豆汁儿‘咚咚咚’一灌，开口骂的，肯定是外地人，如果擦擦嘴问：‘有焦圈吗？’这人绝对是北京人。河南人喜欢喝豆沫，你到小吃摊前听到一声：‘盛碗豆沫，来两根油条！’甭问，绝对是河南人。豆沫与油条是绝配，喝上一口豆沫，咬一口油条，那滋味，沁人心脾……”

优质的豆沫呈半透明乳黄色，精致养眼。其醇厚的小米香伴以豆香、芝麻香、花生香和各色蔬菜的清香，闻着幽香宜人，喝一口浓稠细腻，回味绵长。无论春夏秋冬，喝一口地道的豆沫，犹如饮一壶美酒，满嘴留香。有专家说，豆沫的原料是丰富的谷物和蔬菜，制作方法也很天然，可谓一款真正绿色营养、老少皆宜的健康美食。

文明 中原 豫平



### 蟠虺纹带盖铜盒 (春秋)

李文

于尉氏河东公社周村沙岗出土，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铜盒(gān)高18.0厘米，口径21.5厘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平沿，圆唇，束颈，肩微折，腹下收，小平底，腹两侧各有一环形兽耳。器盖亦为平沿，盖缘置三齿，盖面似穹顶上隆，中央有喇叭形捉手，捉手圈内饰蟠虺纹。盒身束颈内饰一周雷纹，腹饰蟠虺纹和三角蝉纹，间饰弦纹隔开，均呈带状环绕分布腹身，纹饰细密，铸作精湛。

绿城杂俎

### 作家爱上收藏

付秀宏

作家的情感和乐趣，“活”在他收藏的东西里面。

陈祖芬家中，随处可见她从各地背回的奇石、悉心收藏的洋娃娃和卡通玩具等。已故掌故家郑逸梅先生喜欢收藏砚台、尺牍、扇子，他说：“文房四宝，以砚最具耐人摸索玩赏。”据说，他曾藏有一块三国吴主孙皓建衡专砚，砚的四周刻有跋识，其中有米芾的跋语，这块古砚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老作家邓友梅喜爱鼻烟壶，他收藏的烟壶有玉石做的、玛瑙制的、水晶雕的、瓷质造的，美不胜收。邓友梅那富有激情的心动，都灌注到心藏的精美鼻烟壶里，若他笔下有了生命感觉的鼻烟壶一样，是珍品更是珍品。

老舍先生爱看戏，更喜欢收藏名伶的扇子。说及此事，还有一段故事。梅兰芳是真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主演《晴雯撕扇》时，在上台之前，一定亲手画一幅扇面，装上扇骨，带到戏台上，当场再把扇子撕掉。演一场，就画一幅撕掉。梅先生的琴师徐芝源先生看了，十分心疼，待戏散后，他就把撕坏的扇子拾回来，重新裱装好。后来，他把裱好的扇子送给老舍一把。老舍得知扇子的来历后，深为感动。喜爱戏剧的老舍，自此心弦一动，之后他就多方收藏梅、程、尚、荀、袁派名伶用过的扇子，可谓“伶扇荟萃”。

贾平凹钟情奇石、怪木、乐器、土罐。贾平凹说自己——“姓贾便与石有缘，贾宝玉不就是青埂峰上一顽石吗？”他收藏的各类珍贵奇石有几千块之多。他写有100多篇观赏奇石的散文。贾平凹还藏有大大小小百余个古陶花瓶。写字台上、书架上、客厅里、沙发旁，到处摆着土罐子。他喜欢坐在土罐堆中，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欣赏它们的朴素和憨拙。曾有一位甲骨文专家谈起贾姓，说上半部的“西”源于陶瓶的形象，下半部“贝”是贝壳、奇石，即古货币，贾平凹不由感慨：“我爱陶、爱石的秉性，缘是与生俱来。”

肖复兴迷恋收集音乐家传记，收藏音乐会精美的节目单。因而他不放过任何一场由国内外著名演奏家演出的音乐会。音乐收藏，无疑成为肖复兴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评论家雷达醉心收藏古生物化石，古生物在石头里的巧妙定格，使雷达慨叹不已。即使一尾小鱼、一只小鸟，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蚌壳，因意外来临的变故遂化为永恒，成为不朽的艺术，是无可比拟的雕塑。他说，我迷化石，就是迷这种不可索解的悲剧美。

## 连载



### 习仲勋传

1978年7月14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他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目的就是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

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

习仲勋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政策。他说，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外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习仲勋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过去的“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侨眷大加迫害。在顺德、台山等试点后在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强调，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1974年11月10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区的北京路路口。大字报写了67页白报纸，长达26000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100万人进行批

斗。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100多场批斗会和辩论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却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并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16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习仲勋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从1978年的八月份开始，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习仲勋并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勋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习仲勋和省委还对他们们过好春节作了安排。